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北京郊区村落 发展史

尹钧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

尹钧科 著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尹钧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ISBN 7-301-04723-1

I. 北… II. 尹… III. 郊区-村史-北京市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266 号

书 名: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

著作责任者: 尹钧科 著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723-1/K·287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印 者: 北京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1240 毫米 A5 开本 12.125 印张 350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前 言

开辟北京郊区村落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是我在 20 年前立下的志向。

1978 年,我有幸“二进宫”,入北京大学地理系从侯仁之师攻读历史地理学。1979 年 6 月,恩师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工作正式启动,侯老让我们三位研究生也参加了这项重大科研工作。我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除上课之外,便全身心地投入。几年下来,查阅了大量的北京地方文献,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尤其将北京市的山陵河湖、街巷胡同、乡镇村落地名大都装进了脑海里,为较好完成自己所承担的编图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 年夏,在紧张地进行编图工作的同时,也进入要撰写硕士论文的学习阶段。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论文题目,我考虑了很多。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生在山东农村,长在山东农村,对农村比较熟悉,而对城市却很生疏。以往的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多注重北京城,尤其恩师侯老在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成就卓著,造诣极深,饮誉海内外。但是,有关北京郊区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很少有人涉足。我想,北京城作为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千年古都,她的成长和发展必定与其郊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北京城的水源、对外交通、安全卫戍、城市生活等等,都离不开郊区。当然,郊区的发展也深受北京城的影响。北京的城乡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北京城的历史文化与北京郊区的历史文化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如果将北京郊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也开展起来,不但会推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全面发展,而且也会加深对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的认识和理解。经过反复考虑,为了扬长避短,为了开辟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便拟定了《北京郊区村落的地理特点和历史成因的初步分析》这一论文题目。一年后,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

在撰写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要把北京郊区村落的历史发展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搞清楚,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历史文献中有关北京地区村落的记载既少又散,收集资料若大海捞针,又无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资参考。但科学研究贵在锲而不舍,勇于创新。既然对北京郊区村落的研究已开其端,那么就应该坚持研究下去,继续进行深入探讨。1981年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便时常注意积累与北京郊区村落有关的资料,也不断地琢磨这方面的问题。1983年在《历史地理》第三辑发表题为《明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的论文,1993年在同一刊物第十一辑又发表了题为《北京郊区村落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的初步研究》的论文。这些专题学术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为我决心要撰著一部《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1996年,我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了《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的课题,有幸获准立项。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我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必须高度负责地保质保量地如期完成这项研究。经过四五年的辛勤努力,终于于1999年底结束了《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撰写工作,并通过了专家鉴定。

在这里应当说明,《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课题组还有同单位的于德源研究员、毛希圣副研究员和吴文涛助理研究员。在这项研究工作开展初期,这三位同志曾协助我查阅部分历史文献,搜集一些资料,并一起进行野外考察。后来由于种种困难,特别是对北京郊区村落地名不熟悉的困难,没有强求他(她)们分担书稿的撰写任务。但是,于德源研究员曾将与石器时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有关的考古材料整理成文,送我参考。本书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就是参考他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在此,特向于德源、毛希圣、吴文涛三位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此外,这项研究自始至终得到本院领导、院科研组织处和行政处有关同志,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王迎春同志等给予的热情关注和多方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我又不能不感谢荆室叶泰和与我们一起生活已届耄耋之年的老泰水,因为当我每天晚上为这项研究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时,

她们心疼之余也给予充分的理解,并在生活上多多照顾,从而使我在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放手从事研究和撰著。

由于学识奔陋,功夫尚浅,资料未全,思索不周,挂漏讹误,必定多有。倘得学界博雅宏达垂教匡正,引以为幸,感谢之至!

作者

2000年6月30日

于西三旗积粟斋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研究的意义	1
第二节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4
第三节 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的主要方法	8
第二章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地理基础和历史背景	14
第一节 北京郊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变迁	14
第二节 北京郊区历史人文特点及其演变	21
第三章 先秦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的起源与早期村落蠡测	40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遗址依稀可见的原始聚落曙光	40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出现	42
第三节 北京早期村落发展蠡测	50
第四章 秦汉至隋唐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的兴衰	63
第一节 秦汉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的兴盛	63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的兴衰	71
第三节 隋唐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的再度繁盛	80
第五章 辽金元时期——北京郊区村落复杂化	101
第一节 契丹人的内侵与辽南京地区的村落	102
第二节 女真人的内迁和金中都地区的村落	119
第三节 蒙古人的内迁和元大都地区的村落	139
第四节 辽金元时期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特点	165
第六章 明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的蓬勃发展	177
第一节 明初移民和大批新村落的涌现	177
第二节 军民屯田和京郊村落发展的新趋势	184

第三节	修长城备边防和沿边村落的增多与城堡化·····	193
第四节	养战马供军需与“马房”之类村落的形成·····	200
第五节	立庄田设皇庄与称“庄”村落的增多·····	211
第六节	建陵墓修寺庙对村落发展的影响·····	217
第七节	北京城市建设带动起来的郊区相关村落·····	224
第八节	明代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特点和意义·····	233
第七章	清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的持续发展·····	243
第一节	明末清军的内犯和对北京地区村落的破坏·····	243
第二节	清初的“圈地”风潮和大批旗庄的涌现·····	246
第三节	人口的激增对村落发展的促进·····	255
第四节	山区的开发与山村的增多·····	258
第五节	“三山五园”的兴建和相关村落的形成·····	263
第六节	皇室的生活与一些“行宫”村落·····	272
第七节	清末南苑的开放和大批名称典雅新村落的出现·····	283
第八节	清代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特点·····	287
第八章	民国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由缓慢发展而	
	趋于萧条·····	297
第九章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郊区村落的巨变·····	309
第一节	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与近郊村落的消失·····	309
第二节	北京水利建设的成就与部分村落的搬迁·····	314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北京郊区村落的新面貌·····	325
第十章	北京郊区村落的名称、形态和分布·····	334
第一节	北京郊区村落的名称特点和成因·····	334
第二节	北京郊区村落的形态类型和成因·····	342
第三节	北京郊区村落的空间分布特点及成因·····	354
	主要参考书目·····	374
	后 记·····	37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研究的意义

在北京 16 400 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旧城区和新建城区不过 300 平方公里左右,加上拱卫北京的通州、大兴(黄村)、房山、顺义、密云、怀柔、昌平、延庆、平谷、门头沟(大峪)等区县城镇及旧日宛平、良乡县城^[1],总面积也不过 500 平方公里左右,仅占全市总面积的 3%。北京大地的绝大部分都属于郊区农村。全市各区县现有大大小小的自然村共 5775 个,居住在这些村落中的农业人口大约有 407.1 万^[2]。90 年代初,全市的农业总产值达 28 亿元以上^[3],在全市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总起来看,面积如此之广、村落如此之多、人口如此之众、贡献如此之大的北京市所属郊区,无论从居民的收入、消费、住房、交通、卫生、科技、文化等哪方面来说,其现代化程度都无法与城区相比,有些山区农村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因此,北京郊区的发展,任务艰巨,刻不容缓。要使北京郊区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加强对北京郊区的科学研究和发展规划,是根本措施之一。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的研究,正是加强北京郊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生活居住、生养繁衍的场所和进行各种生产活动、社会活动的基地。因此,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与农业的开发息息相关。在一定地域内的若干村落,其形成时间有早有晚,形体规模有大有小,空间分布有疏有密,居民数量有多有少,房屋街巷有新有旧,经济财产有富有贫。如此等等的村落差异,是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既有社会人文因素,也有自然环境因素,但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区域内农业生产力的兴衰、农业开发的早晚和农

业开发的广度与深度。如果排除自然环境的差异因素,那么,凡是农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的时期或地方,农民获得了安居乐业的机遇,村落也必定出现发展高潮,或数量增多,或规模扩大,或村貌一新。同样,凡是农业开发早的地方,并且农业开发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的地方,村落发展的历史必定悠久,推动村落发展的主导力量必定强大,从而形成数量多、规模大、人丁旺、房舍好的村落地理现象。反之,在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或地方,如社会动荡、战火不息、灾荒连年、瘟疫流行等等,迫使农民背井离乡、避灾逃难、家破人亡、田园荒芜,村落必定萧条衰败,甚至化为废墟。而在农业开发很晚的地方,或仅局部开发,甚至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地方,村落必定稀疏,村小人少,村貌粗陋。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排除社会人文因素,单从自然环境考察,那么,凡是地土广阔、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水利富饶、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山麓地带或山间盆地,村落发展历史必定悠久,村大且密,人多势旺。反之,在山岭荒滩、蒹葭草莱之地,因缺水少田,交通不便,恶劣的环境限制着农业开发,村落的发展也必然受到阻碍。由此可见,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不但能对村落本身获得较全面的认识,而且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北京郊区农业开发过程,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北京郊区自然环境的变迁和地域差异。

自辽升幽州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之后,北京这个地方就开始了向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过渡的历程。金建中都;元建大都;明永乐间始称北京,并迁都于此;清因明旧;民国前期,也以北京为国都;1949年起,北京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长期作为国都的地位,对其郊区村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间,北京的城市建设、城市供应、城市消费、居民的风俗习惯以及皇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都在北京郊区村落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因此,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也能揭示历史上北京的城市生活与郊区村落间的种种关系,对于全面认识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辽、金、元、明、清相继建都北京,北京地区的民族构成不断发生变化。先是很多契丹人迁来,继有大批女真人内徙,接着更多的

蒙古人进关,最后是满洲八旗官兵涌入。这种因改朝换代而出现的不同民族的军民随主迁居的现象,是北京史上的一大特点,不仅对北京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促进了北京地区村落的发展。当然,在契丹、女真、蒙古、满族这些北方游牧或狩猎民族的首领为了争当华夏大地主人而大兴干戈、屡屡派兵入塞侵扰的过程中,也曾强迫大批汉民迁往塞外,使塞内的村落遭到严重破坏。明代初年,北京地区已是地旷人稀的凄凉景象。为了充实北京地区的人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强抗御蒙古势力卷土重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明王朝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向北京地区移民,每次移民多达万户甚或数万户,安置在北京地区屯种,从而涌现出大量的新村落。清初八旗官兵入关后,在京畿地区兴起“圈地”风潮,并建立起许多旗庄。这一切都是影响北京郊区村落兴衰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入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还可以为研究北京地区的民族关系史和人口变迁史提供必要的参考。

城市和村落是人类建造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聚落,它们各自孕育了反差很大的文化,即城市文化和村落文化。众所周知,无论从成因、命名、形态、建筑、街道、风貌、交通、产业等方面考察,还是就居民职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人际关系等方面比较,城市和村落都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是历史造成的,是城市与村落的各自功能所决定的。在人类历史上,自从出现城市之后,城市与村落两种不同的聚落文化就开始分道扬镳,并行发展,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进步得更为迅速而已。但是,村落文化自有其独到之处,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村落文化更能体现人类的初始特征,更接近于整个人类文化的本原。从这一角度来说,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也是探讨人类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同一个海港需要有一定的内陆腹地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一个城市也需要一定范围的郊区作为其生存与发展的支撑力量和后备空间。一个海港的运转,必然带动其腹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城市的壮大,也必然会对其郊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产生强大的牵引力与推动力。所以,城市与其郊区是互相依存、

互相影响、互相利用、互相适应的一体化的关系。北京城与其郊区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只研究北京城的发展历史,只注重北京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而轻视对其郊区村落的研究,忽略对其郊区村落的发展规划,就会使北京城与其郊区村落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使北京城市发展与其郊区村落的协调关系遭到破坏,最终会使北京城市的发展失去后劲。因此,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对北京城市规划和郊区村落的规划建设也有所帮助。

第二节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这一课题研究的直接对象,就是北京市现辖行政区域内所有村落。虽然北京城区和郊县城市不在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之列,但是对课题研究对象的如上界定并不是绝对的,必须充分考虑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例如,今北京二环路和四环路之间地带,半个世纪以前还是村落点点、田园片片的郊区,如今却是高楼林立、马路若织的新建城区。这一地带的巨大变化,在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时,无论如何是不能回避和忽略的。又如,今大兴县人民政府驻地黄村,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村庄,如今却建设成为北京的卫星城之一。昌平区西8里的旧县村,现在是一个村庄,可是自唐代到明景泰三年(1452年)以前,这里一直是昌平县的县城所在^[4]。类似这样由村庄变为城市,或由城市变为村庄的现象,也是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的。总之,目前北京郊区村落的数量、规模、形态、分布乃至名称等等,是区域内村落发展延续至今天这一时间断面上的状况。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郊区的村落状况是不同的。理清不同历史断面上北京郊区村落的基本事实,并分析形成这些基本事实的原因,这就是《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课题的主要研究任务。

面对如此众多的北京郊区村落,研究工作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1) 村落出现的历史时期。时间概念是史学研究最重视的问题之一。若不能将不同时期形成的北京郊区村落分别搞清楚,就谈不上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当然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特别是

因为资料的缺乏,欲把北京郊区所有村落形成的确切时代一一考查清楚,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将北京郊区村落中的大部分特别是那些较大型的重要村落形成的大致时代搞清楚,还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把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的主体框架构建起来。这正是本项研究首先努力以求的。

(2) 村落形成的原因。北京郊区村落的成因复杂多样,有的因山岭关隘形成,有的因河湖泉渠形成,有的因移民屯田形成,有的因驻军营房形成,有的因交通道路形成,有的因寺庙坟墓形成,有的因物产开发形成,有的因牧马草场形成,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特别是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是封建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这一决定北京城市性质和功能的根本因素,对北京郊区村落也产生着深刻影响,有不少村落是因皇庄、皇陵、皇家园囿、帝王行宫等而形成的。弄清各个村落的成因,对于确定其形成的时代大有助益。

(3) 村落的规模和形态。村落的规模,是指村落占地面积大小、房舍街巷疏密和居住人口多少。一般说来,村落的规模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以及发展历史长短有密切关系。占地面积广、房舍街巷密、居住人口多的大型村落,要么所处位置和环境优越,有利于村落发展;要么形成时间早,发展历史悠久。反之,占地面积小、房舍街巷疏、居住人口少的小村庄,要么偏处一隅、地贫水恶;要么形成时代较晚,发展历史短暂。因此,研究村落的规模差异,对于深入认识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所谓村落的形态,一是指在平面图上的形状,如是集团型、散列型,还是混合型?二是指房屋建筑形式,如是楼房还是平房,是瓦房、石板房还是泥房、草房,是平顶房还是坡顶房,是夯土墙、土坯墙还是石垒墙、砖砌墙?以及街道的宽窄走向等。可以说,不同形态的村落,既是不同地理环境的表现,又是不同历史文化的反映。因此,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就不能不注意村落形态的差别。

(4) 村落的地域分布。今天的北京郊区村落分布,只要展开一张较大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图,便一目了然。那么,历史上北京郊区村落的分布又如何呢?应当指出,作为一种类型的居民点,村落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固定性。也就是说,一个村落一旦形成,如

果没有天灾人祸的摧残,是会在同一点位上延续数百年或千年岁月的。这是因为我国农民忠实地遵循着“聚族而居”的悠久传统和生活方式,并且又有视地如命、留恋故土的强烈心理。因此,和中国的广大农村一样,历史上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不同历史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的分布,也主要是村落数量与区域面积之比即村落密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某些地域表现比较突出,特别是在那些重点进行农业开发(如军民屯田)的地区,由于大批新村落的涌现,村落密度大大提高,村落数量与区域面积之比急剧减小;而在另外一些地域则表现微弱,如山麓平原和山间盆地,因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人口已稠,村落已密,有限的空间和土地资源已不容新的村落再见缝插针。总之,随着历史上农业生产力的兴衰和农业开发广度与深度的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减和迁移,北京郊区村落的分布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多变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演变的结果,使北京郊区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土地资源与其所能容纳的人口和村落之间,渐渐趋于均衡状态,呈现村落合理分布的模式。如果把不同历史时期北京郊区村落的分布分别搞清楚,并落实到地图上,那将会展现出直观的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这无疑是北京村落历史地理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

(5) 村落的名称。北京郊区村落的名称,称村、称庄、称屯、称营、称堡、称寨、称口、称峪、称河、称泉、称桥、称旗、称寺、称坟、称园、称房、称堡、称城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村落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透露着指称村落形成的时代、原因或其他方面的信息。例如,通州镇南 20 余公里有一个村,名叫“神仙”,是因辽主到延芳淀打猎时在此建有“神潜宫”而成村并得名(“潜”讹变为“仙”)。昌平县东的“阿苏卫”村,显然是因元代的阿苏卫官兵驻屯此地而成村并得名。大兴县东部凤河两岸和顺义县西北部,较集中地分布着诸如长子营、屯留营、河津营、蒲州营、夏县营、绛州营、忻州营、黎城营、大同营、霍州营、沁水营、稷山营、红铜(洪洞)营等用山西省州县命名的村落,毫无疑问,这些村落都是明朝初期安置山西移民时形成的。上述例子说明,村落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应村落的历史。因此,探讨村落名称的由来和含义,是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不可忽视的重

要途径和手段。

(6) 村落的消失、迁移与合并。虽然村落的存在和发展在时空上具有延续性和固定性,但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某些人为因素,有的村落消失了,有的村落迁移了,还有的村落合并了。这种现象在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上不乏其例。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正月初一日(癸亥朔),“溁阴镇大水,漂溺三十余村”^[5]。按溁阴镇在今通州区南境大、小北关和前、后南关村之间,辽太平中于此置溁阴县。据说考古工作者在通州西南某工地地下数米处发现辽代村落遗址,或许就是这次水灾淹没的村落之一。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平谷、三河县地震,“忽地底如鸣巨炮,又似数千马飒沓而至。始而庐舍摇荡,如舟在风浪中;继而全然倾圮,压毙者无算。……是时,城乡房舍塔庙荡然一空,遥望茫茫,了无障隔。黑水横流,田禾皆毁。人多无食,阖境人民逃亡逾半。”^[6]这次地震把平谷、三河一带村落夷为平地。至于灾后或者因修水库、开水渠而造成的村落迁址、人口移居现象,也多见不鲜。北京郊区村落的这种变迁,也是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研究中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

(7) 北京城市生活与郊区村落的关系。历史上北京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安全卫戍、对外交通、皇室活动、居民风俗等等,无不在郊区村落发展史上留下清晰的印记。也就是说,北京的城市生活与郊区村落的关系极其密切。这里仅举一例,略作说明。北京城四郊有相当多的村落称为某某“坟”,如高家坟、白家坟、叶家坟、佟家坟、索家坟、铁家坟、那家坟、雍家坟、闻家坟、草家坟、孙家坟、李家坟、师家坟、邓家坟、马家坟、周家坟、秦家坟、万家坟、蒋家坟、曹家坟、杜家坟、柴家坟、贾家坟、胆家坟、双女坟、十王坟、公主坟、王爷坟、牛录坟、瑞王坟、六王坟等等。为什么北京郊区有这么多的“坟”村呢?这不能不说与北京的城市生活有关。众所周知,居住在北京城内的人们,死后是不能埋葬在城里的。皇室或达官显贵要在距城较远的地方选择风水佳境,修建陵墓,而其他人家大都在北京近郊选择一块土地,作为家族墓地。所以,过去北京四郊坟墓很多,成堆成片,星罗棋布。那些平民百姓家的坟墓也许无声无息地被弃于荒郊,没有留下多少信息;但是,有钱有势、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的墓地,常常有专人

或专户守护。这些护坟人家居住的地方,后来演变成村落,并以坟主姓氏或身份而命名,这就是北京郊区多有“坟”村的原因。这是北京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而影响郊区村落发展的典型例证。至于北京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与郊区村落的关系,后面还要详细谈到。由此可见,在郊区村落发展史上,北京城市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8) 影响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各种因素。任何科学研究的目标,首先在于搞清事实,并对已捕捉到的事实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搞清北京郊区村落历史发展的事实之后,就应当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上北京郊区村落如此发展的原因,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各种因素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毋庸置疑,影响北京郊区村落历史发展的因素很多,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民族交争、农业开发、交通道路、宗教民俗、人口政策、城市生活、自然灾害等等,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后果对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就需要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节 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的主要方法

一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就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这项研究来说,因北京郊区村落是地理现象,无疑应当用地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去研究,但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历史又属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即为北京专史的研究,则应当用历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去研究。因此,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的研究,必须兼用历史学和地理学两门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 文献考证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郊区分别有哪些村落,这些村落是怎样形成的,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发生过较大变化,原因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是研究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必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要搞清这些问题,首先依赖于历史文献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这些历史文献包括正史、实录、档案、方志、类书、文集、笔记、游记、碑文、墓志、家谱等。尽管历史文献种类很多,卷帙

浩繁,但是内中有关北京郊区村落的资料却未必很多,特别是元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北京郊区村落的资料尤为珍稀。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文献资料,把这项研究搞得深入些精细些,研究者必须使更多村落形成的时代和原因,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依据。例如,今昌平区兴寿乡有一个村,名叫“象房”。莫非这里曾养过大象?如果真的养过大象,那又是何朝何代、何年何月的事?《析津志》记载:“象房在海子桥(在地安门外)金水河北一带,房甚高敞。丁酉年(元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元日进大象,一见,其行似缓,实步阔而急擗,马乃能追之。高于市屋檐,群象之尤者。庚子年(大德四年,1300年),象房废。今养在芹城北处,有暖泉。”^[7]按所谓芹城,即指今昌平秦城,象房村正在其北。由此可断,“象房”村处确曾养过大象,事在元成宗大德四年废大都城内象房之后。类似这样的考证是完全必要的,有价值的。假如对北京郊区每一个村庄都能做这样一番考证研究,那将是重大的学术贡献。但是,事实上却很难做到。应当指出,历史文献中对北京郊区村落的记载,往往简略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这就需要搜集来的文献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考证。例如,今顺义县西南部温榆河东岸,有一个村,名叫“古城”。显然,该村是因附近有一座古城遗址而得名。那么,这里的古城是何城?《水经注》云:“灤馮水(今温榆河)又东南流,左合芹城水(今藺沟上源一支)……灤馮水又东南流,经安乐县故城西,更始使谒者韩鸿北巡,承制拜吴汉为安乐令,即此城也。”^[8]据此可断,该“古城”村乃因汉代安乐县故城在此而得名。可是,对汉安乐县故城所在又有他说,以为在潞县(今通州区)西北,即今朝阳区之东坝^[9]。这就需要认真地考辨了。事实上,汉安乐县故城在通州西北之东坝是不对的,因为今顺义县古城村北仍可见到汉安乐故城遗址。

(2) 文物考古法。一般说来,村落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考古学的成就证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以前,北京郊区某些地方已经出现农业生产,甚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平谷县上宅文化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就是说,早在六七千年前,北京郊区可能已出现原始村落。但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三四千年,此前几千年间北京郊区的农